

马士杰与韩国钧的友谊探析

□ 倪文才

我在撰写《高邮近代乡贤马士杰先生年谱》过程中,研究马士杰先生的朋友圈,发现马士杰与韩国钧交往甚密,他们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团结合作,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。他们的友谊为江苏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。

马士杰(1865—1946),字隽卿,号疆恕,江苏高邮人。早年中秀才,1894年(清光绪二十年)考中举人,曾任清朝内阁中书、候补侍读、资政议员。民国时期历任江苏省署内务司司长、代理民政长、代理省长、江北运河筹浚工程局总办等职。善于经商,办有多项产业,1919年与韩国钧联合创办泰源盐垦公司,热心公益,为江苏著名士绅。

韩国钧(1857—1942),字紫石,亦字止石,晚号止叟。江苏海安人,人们敬称其为紫老。清光绪五年(1879)中举,在朝廷先后任河南镇平、祥符等县知事,铸钱局总办,河北矿务局总办,吉林巡按使等职。民国成立后,历任江苏省民政长、安徽巡按使、江苏省巡按使、省长、督军等职。1919年与马士杰联合创办泰源盐垦公司,践行“实业济民”的理念。陈毅同志曾表彰韩国钧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,誉之为“民族抗战之楷模”。

经查有关资料,我们知道马士杰与韩国钧的友谊源于四个核心层面的深度契合:

一、治理江北运河,协同抵御水患

从1913年10月开始,马士杰多次呈请辞去江苏省内务司司长一职,时任江苏省民政长(即省长)的韩国钧极力挽留,见马去意坚决,即请其担任疏浚运河总办。在韩国钧的劝说下,马士杰接受了这一任命。

自晚清以来,随着黄河北徙,漕运废弃,大运河治理不再受到当时中央政府的瞩目。中央政府的退出意味着国家财政支持的断绝,进而导致江北运河年久失修,对整个苏北地区都产生了不利影响。为此,韩国钧计划就地筹款浚治运河。韩国钧清楚,就地筹款,必须得到地方绅商群体的同意和支持,而马士杰为地方绅商群体中很有分量的一员,担任内务司长一职扩展了他的关系网络,无疑是与绅商们沟通的最佳人选。所以韩国钧提请马士杰担任运河督办。而马士杰家在运河边的高邮,他深知运河浚治的重要性,于是接受了韩国钧的委任,开始为筹款治运而奔走。

1914年7月,马士杰任江北运河工程局总办(即局长)至1920年卸任。6年间,马士杰不负韩国钧的重托,勤勉履责,筹款213800余银元;对运河全面进行了测量,并绘图成册;在高邮开办江北水利工程讲习所,培养了126名水利人才。在最困难的时候,马士杰自己垫支3万元支付运河

工程局员工的薪水。马士杰的工作一直得到韩国钧的支持,韩国钧与马士杰一起商量筹款办法,一起研究浚河方案。

1931年8月26日,高邮运河堤决口,里下河遭遇特大洪灾。灾后成立淮扬水灾善后委员会(后改为善后协会),韩国钧和马士杰被公推为主席团成员(主席团共5人),韩国钧为常务主席,马士杰为常委。韩国钧与马士杰一起在高邮勘查灾情,为救灾、修堤上下奔走。1932年6月,应韩国钧所请,马士杰赴上海争取国府水灾拨款,由上海史量才商宋子文部长,最终宋子文拨发20万元给高邮修堤。

二、践行实业救国,合力开垦盐场

1919年11月,马士杰与韩国钧联合创办了泰源盐垦公司。“盐垦”,就是在制盐的地方开垦种植小麦、棉花、大豆等农作物。苏北滨海地区,自古以来即为著名的盐产地。封建专制时代,这里是灶地(盐民聚居设灶煮盐的地方)禁区,绝对禁止垦殖,是以地虽多,但长期废置,不能适当利用。清末,由于海防、财政等问题,才开始许民领垦。旧时产盐之地得以放垦。盐垦之名也就从此成立。

泰源盐垦公司地址在原东台安丰场,收购的荡地在今新农乡境内。韩国钧任公司董事长,经理先后由马叔昂(马家驹,马士杰的三儿子)、卞纾声等担任,职工14人,股本金70万元。收购盐灶186副、田地15.8万亩,有佃农700户、人口4500人。公司的经营:三成留煎(盐),七成领垦。据抗日战争前统计,公司年产棉花6000担、食盐10万担,并生产一些粮食。在生产的同时,还开办了小型工厂,有织布机200台,设立了一个测候所、7座仓库,修筑了62华里的公路,架设了20华里的电话线,还开办了两所小学,一所叫紫石小学(以韩国钧的字命名),一所叫疆恕小学(以马士杰的字命名),有学生近200人。另外,公司还利用沿海草滩发展家畜饲养,有牛1000头、猪800头。由于生产、经营比较活跃,形成了三仓河、一仓河、新农小街一些集镇。公司为了防止东潮西进的侵害,在海边修筑海堤23.5公里。泰源盐垦公司持续经营了20多年,终因资金不足、经营不善和日本侵华战争等原因,于抗日战争期间破产停顿。

泰源盐垦公司的兴办,对开发当时东台县沿海滩涂资源,改良土壤,推广植棉技术,确有成效。经营20多年,生产了大量棉花、粮食,还办了工厂、学校,修建了挡潮堤,所有这些对繁荣地方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马士杰和韩国钧都有“实业救国”的理想,对他们所经营的公司更是付出了大量心血。他们两位多次一起召开董事会、理事会、股东会;多次去垦区视察检查,协调

与大赉界河之争、公司财务问题、还有垦区救灾事宜;一起致电北京盐务署,请求保护盐场利益,等等。他们的合作可以说是情同手足、肝胆相照。

三、关注时政民生,同持济世情怀

马士杰与韩国钧都是举人出身,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,存有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信念和济世情怀。他们无论为官还是从商,都一直关注时政民生,而且两人相互砥砺,常常是共同行动。

1920年4月,马士杰、韩国钧与张謇、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“苏社”,其宗旨是“谋江苏地方自治之发展”。发起组织“苏社”有三个方面的原因:一是江苏省精英在近代对江苏地方政治影响较大,并且有着厚重的历史传统;二是当时军阀割据,江苏人强烈希望能够实现省级自治,发展地方事业;三是张謇作为江苏省极具代表性人物,在南通实行自治,为实现全省自治提供了范例。

“苏社”成立后,对江苏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会集体发声,马士杰与韩国钧的政治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,从而积极参加联署。比如对苏人治苏、江苏自治法案、废督裁军、保境息民、维护江浙两省和平等问题,他们在报纸上发声明,给当局当政者发电文,提出自己的见解、建议和要求。虽然最终没有达到“苏社”所想,但极大地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,对问题的解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韩、马二人还积极做公益善事。比如:1926年,韩国钧将七十寿仪8000元捐出筹办平民工厂。平民工厂的开办,解决了部分贫民的生计问题。办厂中途遇资金周转困难,韩国钧卖字画补贴。1941年2月16日海安沦陷,日寇大肆毁掠之余,将韩国钧苦心经营的平民工厂夷为平地。海安平民工厂,虽运行仅有十多年时间,但开创了海安工业之先河。1923年,马士杰一人出资二七宝银3万多两,捐赠普济号渡轮,摆渡镇江扬州之间,确保长江摆渡安全。事后多年,马士杰多次帮助解决普济号渡轮的管理问题,并去省府争取补贴款项,保证渡轮正常运行。

四、相处亲如兄弟,共守民族气节

马士杰与韩国钧于1914年相识,相处20多年,可以说是情深义重。除了治理运河、合作盐垦、组织苏社等活动外,平时他们之间书信来往频繁,《韩国钧朋僚函札史料选编》(江苏省档案局编,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)收入马士杰写给韩国钧的书信就有27篇。信中有谈运河治理、盐垦公司之事,有谈对国家大事的见解,也有谈家事心事的,彬彬有礼,坦诚交谈,一点也不矫揉造作。韩国钧无论到扬州还是到高邮,马



士杰都会热情款待(马士杰在扬州和高邮都有房子)。1926年3月,马士杰夫人范氏去世,韩国钧专程从海安来扬州吊唁。1938年,马士杰为避战火寓居甘垛,当年8月17日,81岁的韩国钧乘轮船经甘垛,专门看望马士杰,促膝长谈。

马士杰与韩国钧二人的风骨和气节也非常相契。1940年9月中旬,隐居在海安的韩国钧受陈毅的委托,出面邀请了苏北八县绅、商、学等各界知名人士在韩公馆小花厅座谈,并由韩国钧主持,率各界15名知名人士分别致电国共双方,呼吁“停战息争,一致抗战”。这次座谈会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,为新四军取得黄桥决战的重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41年,上海沦陷后,日伪多次威逼韩国钧出任伪江苏省省长,韩国钧痛斥劝降人员:“卖国求荣,死不为也!”直接将其逐出家门。日伪假意提议“移居海安休养”,妄图诱其变相合作,韩国钧予以拒绝。后来,日伪军队包围韩国钧在徐庄的避居所,切断外界联系,实施武装监视,并赠送药品示好,韩国钧声明:“宁死不受敌惠”。弥留之际强撑病体写下“抗战必胜”四字,嘱托家人转交抗日力量。

韩国钧的气节也感染着马士杰。1941年马士杰寓居上海期间,汉奸梁鸿志伙同日本人邀马士杰赴宴,提出要马士杰“出山”为日本人做事,并竭尽威胁利诱之能事,马士杰不为所动,以年迈手抖为托词,予以拒绝。1943年,马士杰搬住到上海拉都路王宅,汉奸殷汝耕派人请马士杰“出山”到汪伪政府工作,同样被马士杰拒绝。

综上所述,马士杰与韩国钧的友谊贯穿于水利治理、实业报国、社会公益等多项事业中,展现了近代江苏士绅阶层的家国情怀与协作担当精神,他们团结合作的深厚友谊成为近代江苏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。马士杰和韩国钧的友谊值得我们研究和

文明是城市之魂 美德是立身之本

